

红心向党 红心可鉴

——缅怀老伴梁燕

○黄竹琴

梁燕走了，2008年6月7日上午，凶恶的肺癌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这之前不久，他刚满80周岁。亲人的哀泣，好友们的叹惋，回天无力，他还是远去了。

然而，他慈祥俊朗的面容，幽默睿智的谈吐，却定格在关爱他的人们的心上——音容常在；他具有传奇色彩、曲折跌宕革命一生的经历，始终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永志难忘。作为他的终生伴侣，又是“战友”加“同行”，知心知情，特于此记下这位革命人的简要生平，以资作一个文字上的“留痕”“纪念”“传承”。

清华学子 献身革命

梁燕原籍贵州荔波县，1928年5月5日出生于澳门，抗战时随父母来黔。少时即好学敏行，初中、高中六年就读于大后方名校——由一批清华大学校友创办、地处贵阳郊区花溪的“私立清华中学”。学校良好的素质教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的涵养，为他日后德、智、体、群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中学时候积极活跃，负责清华中学文学会的活动，黔南事变时，即与几位同学少年一道，勇挑重担，在崎岖的公路上，驾驭马车为学校运送疏散物资。

1946年夏天，他以优秀的学习成绩，被保送到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50级）。同学们来自各地，正如梁燕形容过的“各路诸侯，人才济济”。这时民主爱国运动的革命大潮席卷北平，席卷清华园。梁燕和二十多位同学一道，建立起“戈壁草”读书会，他们自称“草民”，课余读革命书籍——《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母亲》，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戈壁草”的启蒙学习给了梁燕深刻的影响，他在后来写的《戈壁吟》中写道：“清华园中，曾有过青春岁月，一心学牛顿大师、居里女杰。神州大地烽烟炽，华夏黎庶生路绝，高举起民主爱国旗，信崇马列。”以后“戈壁草”草民们数十年联系、切磋鼓励，他又写道：“夜夜梦回清华，绵绵‘戈壁’情，永不绝。”

1947年5月，梁燕和“戈壁草”多人，在清华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被同学们称为活跃分子：或是参与经营作为活动经费来源的“西山文化服务社”；或是到工厂夜校给工人上课；或是随同杨坤泉同志到静海县营救赴解放区过静海时，被反动当局扣押的戈壁草成员张永备、胡随善同学；或是参与一些游行示威活动。为了

宣传工作的需要，他常常一个人编排几份墙报——《莽原》《清华评论》《大学评论》，多在夜间编排，靠抽香烟解困，从此成了“烟民”。

1948年夏天，根据“解放全中国”革命大形势的需要，学校党组织接受中共上海局（前南方局）城工部长钱英的指示，派一部分家在南方（特别是“两湖”“西南”）的党员学生回乡从事地下工作，以“发动群众，积蓄力量，迎接解放”。作为黔籍学生，梁燕积极响应，主动请缨，一向以数理见长的他，辍学告别了“科学家摇篮”的清华大学。他不顾西南国民党反动势力严密统治的险境，勇挑重担，只身来到贵阳母校清华中学求职，以教书为掩护，“摸情况、打前站”，开辟工作。不久，上级派来也是清华大学学生的领导人姚国安和党员黄培正来清中任教，又派来从香港接受任务过来的党员安粤，根据梁燕的举荐发展清华中学11级的学生朱厚泽（朱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等职）入党，他们以清中为据点，建起了“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简称“特支”）。1949年2、3月还建起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几位党员分工，梁燕分管领导贵州大学的“新联”工作，起初还以“苏兆敏”的化名到城里与从香港来的安粤接头，为领导姚国安当联络员，还担任“特支”学习文件、指示文件的秘密刻印工作，专学仿宋体，手指头上因刻印钢板积起厚厚的老茧。

梁燕在贵大积极发展“新联”盟员，与盟员中的甘凌杰共同领导“新联”工作，配合校内其他革命力量，推动该校学运。他们又是建“歌咏队”，又是办“读

书会”作为阵地以联络人、发动群众。我是在他的清中校友张志达家初识他的，一听说我是刚从南京中央大学回乡转学来读贵大的，便热情地加以联络团结，我也就参与到他们读革命书、唱进步歌及民歌、学扭秧歌的活动中去了。当时梁燕白天要在清中给学生上课，晚上还要不时深入到贵大活动，有时忙到深夜，才独自步行回到地处山边的清中教师宿舍。一次听到他说：“这山边，说不定有时还会遇到狗呀！”我只认为指的是豺狗（狼），后来才悟出也指国民党的特务。在贵大，梁燕还化名写出《转折点》等壁报文章指导运动。我们渐渐相好了，一次，梁燕给我谈苏联革命小说时，同时将二战时期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诗《等着我》念给我听：“等待着我把，我会回来的，但你要长久地等待……”还说：“多读些书，将来我们要 $1+1>2$ 。我当年认为他充其量是个进步爱国的热血青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一个地下党员，更不明白这些谈话中会含有什么暗示。

在“特支”和“新联”的工作中，贵阳先后在大学、中学、工厂中发展了40多名“新联”成员，后来成为各时期的革命中坚。贵阳大、中学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蓬勃展开起来，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作为贵阳“特支”“新联”组织开创人之一的梁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当是他革命里程中任务最艰巨，斗争最坚决，表现最杰出的一段经历吧！

为了纪念地下斗争的岁月，他后来给子女起名，都用上当时的“化名”，足以见其深情。

情系故里 再战贵州

当时的贵州，国民党反动头子谷正伦主政，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势力十分猖獗。1949年6月，传出特务在打听姚国安这个人的信息，“特支”部分成员被“盯”上了。领导人姚国安同志决定，他本人、梁燕、黄培正三位南下外来的同志迅速转移，“特支”“新联”工作交给安粤、朱厚泽同志去领导了。他们三人机警多谋，假装买飞机票到重庆，实际上坐车到柳州，转飞香港。特务冲到清华中学搜捕他们落了空，真是险落虎口啊！当时梁燕的大姐梁昭莹住在柳州，他们三人买机票赴港钱不够，适逢柳江涨水封渡，梁燕冒着大水买船票过江到大姐家才弄到银元。解放后，听梁燕的大姐说：“好险呀，他们才飞去香港不久，通缉追踪的特务就进我家，盘问梁燕哪里去了。”

姚国安、梁燕他们在香港未接上组织关系却遇到一道从清华大学南下到重庆、此时撤退到香港的同学戴宜生，四个人决定结伴转去解放了的武汉接组织关系，但必须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他们经广州到岳阳后，化装成跑单帮的卖药小贩，冒险花钱买通搜查人员，坐小木船越洞庭湖封锁线才平安到达武汉，被编在武汉市党训班学习。梁燕即将分配到武汉市政协工作了，他听说有“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即将随大军西进贵州，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解放事业、对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的深情驱使，尽管贵州曾被人称为“至贫至弱，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三无”省份，他还是毅然主动找到贵州干部队，决定再回贵州。据也是干部队成员的李增贤同志讲，当时搞组织工

作的同志曾说：“人家梁燕堂堂的大学生都要求去贵州，我们欢迎呀！”李说，他自己也深受鼓舞。

请写上“党外布尔什维克”

梁燕随大军进入贵阳后，两年多时间内先后任贵阳团市委学校部长、青工部长、宣传部长、工训班教育科长、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做开拓性工作。1952年5月调团西南工委《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1954年该杂志交由四川省团委主办）。整党时被停止党籍，审查家庭和历史，因梁燕父母兄姐于1949年迁去香港，审查他是否是潜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整党毕得以澄清恢复。1958年2月却又被错划为右派，他其实并没有鸣放什么，起初还是“红领巾社”反右领导小组长，一位上级提出要划“红领巾社”7人为右派，梁燕讲求实事求是，指出其中5人虽过去有这样那样问题，均已结论并无新问题不应划右派，就被定上“包庇右派阻挠反右斗争”的罪名，加上他不久之前订出《红领巾》杂志的办刊方针：“不但要有指导性，还要有知识性，趣味性”，被批为资产阶级办刊方向，而他又调进几位儿童文学有成但出身不好的人入社，就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九级，下放四川省冕宁县农村劳动锻炼六年（其中动员退职当农民一年）。1964年安排到宜宾县双龙区供销社采购站工作，这次全家从省城随着迁去基层。

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期间，梁燕始终坚信党、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几十年来从未听到他有什么怨言。尽管他从不认为自己

“反党”，但认为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社会关系复杂，弱点多，缺点也不少，自己就老老实实地劳动和改造。他身条瘦弱，80多斤躯体常努力背负一百多斤的重物，还积极为农民做些事，如算账、研制小化肥等。在基层做收购站工作，他从早干到快天黑，中午不关门不午休，说“农民翻山越岭背东西来卖不容易，早收购他们早回家休息”。他坚持上级规定的收购政策，从不让人（包括家属）将应收购上交的名贵药材、山货、稀缺农副产品私自套买。他常说：“毛主席教导‘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我们还应该重视发展生产，才有东西可收”，因此搞一些推动农家养良种羊、种优质茶的工作。一段时间，上级供销社要求收购蛇以取蛇胆供药厂制药，工作人员害怕碰蛇，他就把收蛇的任务承担起来，他说：“可以学嘛！”细心体会，来个胆大心细，亲自用双手捉蛇、验蛇。他重视劳动锻炼，在给大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来读‘农中’我很高兴，半耕半读是方向，是改变几千年来读书人只会读书，脱离劳动生产恶习的根本措施，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提倡的。”他总以多工作为乐，当平反落实政策时，对于工作安排，他在给家人的信上说：“哪里不是工作，哪里不能‘安家’？于公来说，只要能够多做些工作，于私来说只要有一个安定的晚年……”他移位不移志，他曾告诉我，他当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时，一次患水肿病几乎死去，他曾托付别人：“我死后，请在我的墓上写上‘党外布尔什维克’几个字”。他曾在一篇文中写着：“要像长在恶劣荒漠环境中的‘戈壁草’，始终顽强地挺立、生长。”

出版战线上的尖兵

1976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举国新生，梁燕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他被调回《红领巾》杂志社任总编辑，以后半生献身人民的出版事业。1980年10月，上级派他组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社长，1983年调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其后兼党委书记、出版总社委员。喜欢多干事的他，在出版战线上干出业绩，显出亮色，成为尖兵。他为组建四川少儿出版社作出贡献，醉心于高起点，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亲自策划主持推出丰富儿童课外阅读的近百种的“小图书馆丛书”，主持推出市场缺项的《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辞典》等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支持推出具有开拓性、前瞻性的《走向未来》大型丛书出版……他勤学多思，长于思辨，虑事超前，多角度思考问题，又能沉着应对，被同志们称为点子多，办法多，抓得住要害。他在较早的年月，就注意要开拓创新，科学办事。在四川搞出版时，既坚守出版物的党性原则，但又强调“出书、管理双肩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讲求”，指出“图书不仅是教育工具，它同时也具有商品属性……”他重视抓根本，抓职工队伍、作者队伍的建设，如：在川少社举办过两期全国儿童文学讲习班，在川人社内安排举办编辑、出版宣传、装帧设计、经营管理等多种学习班和讲座。

1985年底，由于家乡老领导的建议，他怀着深厚的乡情，主动申请到家乡贵州工作，三度回乡献力。这时，他婉谢了重庆、海南有关人士约他前去搞出版的提议。他去贵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评为

□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

“编审”职称，其后任了几年顾问。这时贵州人民出版社正由过去的“县处级”单位升格，他和也是新调来的社长联手大干起来。改革开放不算久，刚批过资产阶级自由化，总编辑的工作是敏感、被称为“走钢丝”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党员、革命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梁燕，并不甘于碌碌无为而是渴望有机会为党的事业、为社会有所作为的，尽管当时路上存在着风险，只有以自己的革命良知和胆识去对待了。他又是整合原选题，又是开拓新选题。不久，便亲自审定拍板推出由责编许医农同志精心组织的具有配合解放思想意义新潮流《山坳上的中国》一书。当时承担着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料书出后却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贵州社也声名鹊起。梁燕经常会遇到疑难稿件，他并不莽撞从事，而是在创新与风险如何平衡上很好地掂量，决不能出坏书，又不能放脱确有价值的书。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只要我们准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敏锐体察社会发展的进程，善于捕捉读者的需求和关注点，及时抓住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便可成功适时地推出好书。”又如他还支持、拍板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的传记《何应钦传》的写作和出版，对作者说：“《何应钦传》不是不能写，而是看你怎么写。”细心指导严格把关。出书后个别人风言风语说：“前×省委书记的传记你们不出（因写作质量不够），却去出《何应钦传》”，有关领导也口头招呼不叫重印了，却被山西出版社看中，向作者买版权拿去重印而畅销了。梁燕重视文化积累，亲自策划、主持邀请名家编译、推出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大型丛书，及《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故事大全》丛书，深受

读者好评。又策划《贵州先贤》丛书，发掘、编选、出版了极具近代贵州史料价值、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的作品《周素园文集》。在管理上，他较早地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内实行“二级核算”，写出各种有关管理的杂谈指导工作，促成贵州出版社大楼的早期建成，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梁燕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尤其是史书），文理兼备，知识面广，工作效率高，终审稿件在千万字以上，还写出许多精辟的审读意见稿。该社副总编毛希谦同志后来赠句留言称他：“三年执掌黔版事，有勇有谋困厄消。挚爱书卷情不已，为人作嫁岂辞劳。”诚如是也。

梁燕还担负不少社会工作，1988年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史学会顾问。他历时近十年阅读几百万字史料，参与《贵州通史》二卷（贵州军阀史卷）的主编及编写工作。还为母校清华中学校友会做些事，病逝前几个月还在为学校编书。

多年来，我总见他忙于公事的时间居多。家里的事他说应担当一点，亲手做饭做菜，他也长于此道；我承担其余全部杂事，但大事仍由他定。他风趣地说：“在家里我是国家元首兼炊事员”，或诙谐地说：“各种家务嘛，我还有个私人秘书呵！”大家相互支持，一个家各得其所，和谐有序。

恭俭一生

梁燕为人虽然内心也自视才高，但实际上并不张扬，他厚道和蔼，和颜悦色，低调为人，从不说人短长，他团结爱护同志，不嫉恨任何人。不论居家或处外，从

不与人红脸或大声训斥。他正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搞小圈子，一视同仁，拥有老一代文人的道德素养。

他不谋私利，注意律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好品性。他不因私事用公车，出公差不顺道游山玩水——到上海出差，未到苏杭；去济南办事未登泰山。他不赞成教育部规定的“解放前因革命工作需要上大学辍学的学生可补办大学毕业文凭”，说：“肄业就是肄业，没毕业怎能说毕业”，始终未去补办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他不愿享特殊，不去作侨眷登记。一位当年与我一起在贵大参加一般学运活动的熟人，要他出证明说明我们二人曾参加地下党“外围”以便办成离休干部，我不同意，他也拒绝说：“组织上没有履行参加就是没有参加嘛！”他落实政策调回《红领巾》杂志社任总编，领导层中有一个提薪指标，他20多年未提过工资，却让给另一位工资较低的副总编。多年后，红领巾社的老同志廖德嘉还在称赞他：“百川归海胸能容，五车学养脑特灵；平民意识无官气，人气飚升有盛名。”直到他已是耄耋老人，重病亡故之前，还对儿女们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梁燕思想活跃，遇事有独立见解，实际上作风朴实正统，恭俭一生。他党性强，组织纪律性也强，总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威信，不赞成片面偏激，我们有时对上级工作中的人和事说点牢骚话，他不附和，还会说：“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事物总有复杂困难的一面。”他严于自律，1986年回贵州工作，还写短文说：“人谓吾有三气过人——志气过人，才气过人，傲气过人；前二者犹可，后者误我，谨之慎之。”晚年常写些警句自

勉：“神定体乃健，欲寡心自宽”、“不怨不尤清平乐，无愧无作逍遥游”。他曾戏称“自己属于1.5代”，即既没有第一代老人的墨守成规，也没有第二代新人的新潮离谱。他干事常因为看问题敏锐、超前，一时被认为有点“另类”，但事后发现他往往是正确的，正如党组织在他右派平反结论上定的：“梁燕同志当时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本来就是正确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常怀赤子之心无愧无作的人吧！

人们怀念他，敬重他，这里，我转录几份友人们写给他的唁电悼词作结吧。老战友安粤、朱厚泽、赵希林、姚礼乾等人写道：“梁燕同志在‘中共贵阳特支’和‘新联’的工作及为贵州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永远载入贵州史册。”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罗尔纲写道：“梁燕同志的道德学问是我们的榜样，他对罗尔纲著作在贵州社出版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贵州出版社著名资深编辑许医农在电话中哀悼泣诉说：“梁燕同志功不可没，没有他，《山坳上的中国》一书出不来……”贵州人民出版社的悼词说：“梁燕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干部，他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光明磊落，得到了同志们的肯定和赞扬……”作为家属自是充满敬爱之情，我的结语是：梁燕，红心向党，红心可鉴……不过，一向低调不多谈自己、总称自己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以及一株“戈壁小草”的他，对我们的赞誉会赞同吗？我们大家自然是出于“爱之深，赞之切”，然而，我们是真诚的。

梁燕，安息！